

全国政协提案宣传工作忆往

刘晓冰



景信息，点名信息背后蕴含的意义。2011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第一次把网民关注的30个问题整理并印发给委员，作为提案征集的线索。这一创新做法引起记者们的关注，在媒体介绍这一情况时，我特别点明其意义所在：可以帮助委员更好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作用。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对此作了重点报道，仅中央电视台（2018年归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有《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1+1》《经济半小时》《中国新闻》等多个频道和栏目分别进行了报道。网民们对此也有热烈反响，认为“真好，终于让网友的智慧有了落脚之地”，“这是体现网络民主的一次大飞跃，是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反映了群众的心声”等等。由白岩松主持的新闻频道《新闻1+1》栏目组就此专门制作了一期节目——《带着民意上两会》，反映并解读了这一提案新举措。

同一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也进行了修订。媒体很关心其中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意义。《新闻1+1》栏目组对我进行两次专访后，又以修订条例为主要内容，以《跟提案、议案较真儿》为题，制作了一期节目，将条例提高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的重要意义，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和解读，扩大了传播效果。

关键时刻有定力、敢发声

2012年3月3日晚上8时，应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年归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政务直通》栏目“2012两会特别节目”邀请，我作为该节目的第一位嘉宾，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直播间，就政协提案和提案工作接受了一个小时的直播访谈。这是全国政协大会提案组负责人第一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直播专访。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网进行视频、文字同步直播，中国之声微博、两会直播微博等多种媒体也进行同步直播，网友可以提问。

访谈中，主持人和我就政协提案和提案工作进行交流，同时回答网友的提问。一个小时的问答并且是直播，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另一方面不能出错，事先没有任何演练，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其间，在我介绍大会秘书处对委员提案的审查处理很认真很慎重、有时交办一件提案要反复征求多个部委的意见时，主持人突然发问：“这中间会不会出现扯皮呢？”应该说，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会”或者“不会”都有不妥。当时我的回答是：“协商民主嘛！提案办理的过程，就是民主协商的过程。”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没有说错话，一方面是平时注意学习党中央对政协工作的要

求、学习人民政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我始终注意把握关键点：做提案宣传工作，宣传的不是自己，也不应停留在提案工作本身，而是通过介绍政协提案工作，进一步宣传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宣传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归根结底是维护党的领导。立足这一点，就把握了政协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回答问题心里就有底。

另一次也是在2012年3月，13日早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会开始前，我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会场接受了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5分钟的现场直播连线采访，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政协全体会议现场邀请嘉宾进行直播采访。而我接到这一任务是在前一晚，根本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全靠平时的积累。

13日一早，随着直播时间的临近，大会堂一楼已经有很多委员进场了，现场人山人海，有很多人围观。8:40，直播准时开始。时任两会新闻组组长到场维持秩序，观看直播情况。我从容地介绍了本次大会的提案情况，介绍了政协委员如何通过提案关注民生、为民履职。直播结束后，不少同志对我说“很好”，央视的采访记者也说讲得好，直播很成功。

回顾那5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我代表政协大会提案组共接受媒体采访120余次。其中，既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也有地方媒体；既有一般的大会程序性报道，也有专题性深度访谈；报道形式既有录音，也有现场连线直播。这段提案宣传工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政协工作人员，能够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想清楚、讲清楚，关键时刻有定力、敢发声，靠的是不断学习、深入研究、用心思考，从而抓住特点、把握规律，做到心中有数，这应该是每个人努力练就的基本功。而心中有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的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就是总书记强调的“懂政协”。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75年砥砺奋进，政协提案工作为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所记述的只是这历史长河中的几个点滴。相信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人民政协提案工作一定会书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

病危，但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关心下，在中央医院精心救治下，他一次又一次迈过了鬼门关。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阶段。根据党中央批示，王观澜夫妇启程去赴苏联治病。

在苏联治病期间，健康状况稍有好转，王观澜就开始参观莫斯科的工厂、集体农庄与合作社，他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机会来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

但王观澜并不盲目追崇苏联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农庄的那套经营方法，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地广人稀、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他说：“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王观澜说，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得到党中央同意后，王观澜夫妇很快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张照片，正是二人在回国前的留影。再看流露出的这份喜悦，更多了几分赤诚与期待。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政协）

文人逸事

朱自清的“秀才人情”

夏明亮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飞涨，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家庭生计捉襟见肘，于是决定让妻子陈竹隐带着孩子在物价相对较低的成都居住，朱自清只是在假期回到成都与家人团聚。

在成都，陈竹隐遇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刘云波，这时刘云波在成都军校医院妇产科担任主任。朱自清、陈竹隐和几个孩子都到她的医院里看过病，她知道朱家的经济窘况，从来不收一分钱，而且总是用最好的药，给予最好的治疗。

最让朱自清难忘和感动的是，1944年春，四川流行麻疹，朱家三个孩子都传染上了，很快，3岁的小女儿转成了可怕的猩红热，两个10岁左右的儿子转成了肺炎。陈竹隐心急如焚，朱自清远在昆明

鞭长莫及，在危急情势下，刘云波成了朱家的主心骨。在她的殷殷照拂之下，眼看命垂一线的小女儿又活蹦乱跳了，两个儿子也健康痊愈了。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在扬州的二女儿朱迅先患上了斑疹伤寒，22岁的大姑娘不到两日竟撒手人寰。两相对比，朱自清觉得，小女儿真是幸运，凭空捡了一条命。

朱自清思前顾后，想了很多，面对刘云波这位朱家的贵人，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反复斟酌，撰写了一副对联赠予刘云波：“生死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后来，朱自清又撰写了一篇朴实真挚的散文《刘云波女医师》，发表于当时重庆的《人物》杂志。对这样的恩人，朱自清无以报答，只能用“秀才人情纸半张”来表达自己心底里的感激之情。

张伯驹写挽联

王剑

1957年春，陈毅元帅到北海公园参观明清书画作品展。他一边走、一边看，一幅幅旷世珍品令他赞叹不已。

经询问得知，拥有展品的人名叫张伯驹，是一个收藏家。为了护持国宝，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豪宅”也不改其志。后来，他陆续把自己收藏的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赵伯时《雪江归棹图》等118件书画珍品无偿捐给了国家，实现了“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夙愿。为此，文化部还专门举行捐赠仪式，给张伯驹颁发了褒奖状：“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

陈毅闻听后，深受感动。随即打电话给张伯驹，邀他到家中做客。张伯驹对陈毅仰慕已久，陈毅的豪爽、诚恳，消除了张伯驹的拘

谨。他们谈诗词、谈字画、下围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伯驹后来回忆道：“全国解放一年冬，余在上海，曾趁谒陈师，值其去南京，未晤。五七年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陈师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截，全出于诚。”

陈毅去世后，张伯驹含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横扫接尊，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含笑。仁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这副长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陈毅夫人张茜趁机会介绍了张伯驹目前的困境。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国家应该保护啊！”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夫人潘素被聘为中国画院画师，不仅给他们恢复了北京户口，还解决了住房问题。

梅兰芳创作《春消息》

周惠斌

1938年，梅兰芳率剧团赴香港演出，《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极大地鼓舞了华夏儿女的抗战斗志和救国热忱。1941年香港沦陷，梅兰芳结束在香港4年的隐居生活，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但他蓄须明志、以画自遣，拒为日寇演出。

梅兰芳在上海曾以松树为题材，反映不屈不挠的松柏之志，并题写诗句“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借以自勉，画画一度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那段日子，梅兰芳的经济状况愈益困顿，为了养活家人和梅剧团成员，他变卖了大量家产，甚至卖掉了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通过银行借贷来维持生计。由于失去收入来源，他只能靠绘画、卖画稿以维持生活。

194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风雪交加，梅兰芳把家里的窗帘拉

好，打开收音机，静静地收听电台广播。当他从短波里听到日本又打败仗的消息后，欣喜万分，当即创作了一幅红梅图，命名为《春消息》（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收藏）。《春消息》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借物抒情的表现手法，梅树苍劲，梅花盎然，清新柔美，横卧向上。整幅作品笔触舒展，格调高雅，境界脱俗，寓意胜利的春天即将到来，梅兰芳虽然身处艰难环境，但笔下的红梅表达了他对抗战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

1945年春，梅兰芳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幢洋房内举办画展，展出作品170多件，其中包括那幅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中国人民终将迎来晨曦微明的画作《春消息》。画展上，人们钦佩梅兰芳的高尚气节，纷纷选购，最终售出十之七八，这是梅兰芳所始料未及的。

刘国钧创业

周星

刘国钧出生于家境清寒之家。父亲是读书人，母亲帮人做工，全家仅有一间房屋。1902年，16岁的刘国钧经乡介绍，来到常州奔牛镇元丰布店学做生意。不久，家乡有祝姓老翁愿将孙女许配给他，尽管其父母婉拒，但祝老执意玉成，成就了这桩姻缘。婚后，刘国钧携家属迁至奔牛，租沈姓房屋定居。

几年后，元丰布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刘国钧便在奔牛横街万缘桥下创建勤丰布店，他注重大小生意，还挑担下乡营业。凭借着出色的经营和不懈地勤奋，布店生意日益兴隆。随后，他承接了经营不善的和丰布店，扩大经营并添设染缸，由于花色新鲜及时，营业不断增长。此时，他意识到印染对布匹销售的重要性，为日后发展纺织印染工业奠定了基础。

为招揽生意，刘国钧在店铺挂起“外国绸缎，英国喇叭”招牌，却招来无业游民寻衅。他们

逼刘国钧拿出货物，未见回应便放石头在柜台阻止营业，甚至有人上前动手打人。虽花钱平息了风波，但此事在他心中埋下了向外发展的种子。

刘国钧在奔牛苦心经营前后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共有十个结义兄弟，皆是商业巨头。他们非常钦佩刘国钧实业救国的宏愿，全力支持他赴常创业。民国初年，刘国钧将和丰布店盘给同乡，离开奔牛前往常州，开启了民族工业的新征程。刘国钧不仅爱国，还热心地方公益事业。1934年，奔牛镇各界人士创办树人中学，经费紧张时，刘国钧慷慨相助，被聘为校董。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奔牛故旧常有资助。1966年，奔牛镇欲建新戏院，他愿独资建造，虽未达成，但他的赤诚之心令人敬佩。

刘国钧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奔牛创业起步，到成为纺织巨匠，书写了一段实业传奇，其精神和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政协记忆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提案工作伴随着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75年来，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5月至2013年3月，我担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大会提案组副组长，负责会议期间的文件起草、提案新闻宣传等工作。其中代表大会提案组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宣传介绍提案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把该说的理清楚、说到位

提案工作涉及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协专门委员会和提案承办单位等方面，内容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诸多领域。要在宝贵的播出时间内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面向公众讲出他们希望了解的信息，就需要加强研究、把握要点，把该说的理清楚、说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介绍提案工作的新举措新面貌，把当中蕴含的意义、折射的道理挖掘并提炼出来，尽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通过提案工作，了解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了解人民政协这一民主形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了解广大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不懈努力，这也是政协工作者的责任。

为此，每年两会前，我都要认真学习、精心准备，努力使自己的介绍准确、到位。接受采访时，真诚地回答每一位记者的提问。当面对一些不太了解政协和提案工作的记者时，为了加深其理解，我特别注意多为他们提供一些背

光影史话

王观澜：万里耕桑的坚定足迹

何薇薇

1949年9月15日，王观澜与徐明清在克里米亚燕子堡前留下了光阴一瞬。照片中的二人眉开眼笑，时隔75年，如今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当时的喜悦，很有一种“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飞扬神态。

这是王观澜夫妇在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后的反应。尽管远在苏联，但新中国的炽热横穿千里，灼得他们待不住了。王观澜说，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1906年7月，王观澜出生于浙江临海。王家家境贫苦，王观澜直到9岁才走进学堂。他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发奋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6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预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白天读书，晚上兼职抄写稿件，赚取微薄报酬。

在“六师”学习的日子，正是革命思潮兴起的时期，王观澜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思想觉悟迅速提升，凭借好口碑和领导力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25年，王观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担任团支部书记，是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任“六师”简师部学生党支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掩护战友、组织抗议，困境之中毅然决定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在此后的岁月里，王观澜先是被派往莫斯科深造，学成归国后，又参与了土地革命斗争、创建“红中社”、主编《红色中华》等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期间，



他遭到王明等“左派”的诬陷打压而被开除党籍，也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得以恢复党籍并担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正是在这个时期，王观澜对“三农”问题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为他日后在农业岗位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路。王观澜勇担筹粮重任，却在外出筹粮时，因断粮误食而患上痢疾。据王观澜的女儿回忆，父亲曾提起过这段往事，痢疾拉得太厉害，几近虚脱，是战友们半抬半扶，他们才赶上了大部队。而为了节约药物给其他战友，父亲硬是扛了下来，却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瓦窑堡会议后，王观澜受命担任土

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后又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兼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在统战工作中，王观澜再次遭遇王明等人的打压，被指有“托派嫌疑”。但毛泽东力挺王观澜，称“王观澜经过了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在陕北，因过度操劳，王观澜在长征途中埋下的病根屡次发作，最终支撑不住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期间，毛泽东曾专门到医院探望王观澜，后又写信宽慰他要好好养病，信中的“既来之，则安之”，更是成为许多人在面对疾病时，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精神支柱。王观澜的病情反复，几度